

往事·故人(二)

我所知道的呂光博士

●王康

與許崇智友誼深厚

從台灣行銷海外的報刊上，獲悉東吳大學前法學院長呂光博士病逝台北，使我內心感到無限哀傷。某教授在一篇文章裡說，呂博士在來台以前曾任上海新聞報「總經理」，據我所知，與事實略有出入。抗戰勝利後新聞報的總經理始終是詹文滸，呂光任「經理」，比「總經理」低一級

，「協理」為畢業于聖約翰大學與嚴前總統家澍有親戚關係的蘇州人聞天聲。聞天聲曾于民國三十六年秋天訪台，其時嚴家淦任台省財政廳長，嚴廳長在官邸歡宴聞「協理」，我也曾敬陪末座。新聞報經理部的大權操在詹文滸與聞天聲之手，呂「經理」只好「無為而治」，落個「無責一身輕」。呂「經理」第一次到台灣旅遊在民國三十七年夏天，他是陪民初粵軍總司令許崇智（號汝為）將軍與上海法學院院長何世楨應省主席魏道明伉儷之邀，來台遊覽兩週，我當時是新聞報駐台辦事處主任兼特派員，曾陪伴他們環遊全島，並和許崇智將軍成為忘年之交。許將軍回上海後曾親筆寫過一封很富感情的信給我，可惜我十

八年前移民美國時已將原件遺失，否則，我也可以向讀者炫耀一番。從那次旅遊，我已看出呂光博士與許將軍及何世楨決非泛泛之交，而是有相當深厚的友誼。

英文一流中文略遜

呂光自美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最初被蕭同滋延攬至中央通訊社總社，擔任該社英文祕書，由于他的英文雖屬第一流，可是中文根基不及中文祕書曹蔭樾遠甚，而在當時的中央社工作，需要有揮灑自如的中文文筆才能出類拔萃。呂博士離開中央社，可能與他的中文程度並非第一流有關。呂博士到台灣以後的中文稿，初期係出自潘賢模之手，潘兄在中國大陸與國變色前為新聞報駐福州記者，民國三十八年初自閩來台，與呂博士過從頗密，經常為呂博士捉刀。

新聞報的四巨頭如社長程滄波、總編輯趙敏恒、總經理詹文滸、經理呂光，自徐蚌會戰失敗以後，想法和打算各不相同，程滄波反共最烈，他知道共產黨佔領上海後他的日子一定不好過，乃於三十七年底離開上海，先到香港，因為他是

新聞界選出的立法委員，故一年後由港轉台，直至他埋骨寶島。趙敏恒何以不來台，後來不幸死在中共的監獄裡，已故的新聞報老同事趙世洵兄已有詳細的敘述，不過我在本文裡要補充的是趙敏恒有一胞妹於抗戰期間在渝下嫁台灣苗栗籍張某，民國三十四年年底隨夫來台，她的丈夫不久在台灣官場失意，乃攜眷回苗栗定居，並轉業

經商，但他在商場上仍不得意。我到台灣後，趙敏恒曾寫信給我，囑我與她聯繫，蔣中正總統引退後，趙女士曾到台北找我，要求我寫信給她胞兄，勸他全家撤退來台，她說，他們如定居苗栗，生活上決無問題，我如實寫信給趙敏恒，可是他硬不接受其胞妹的建議，他如泉下有知，一定會非常後悔！

詹文滸沒有逃到台灣，內情較為複雜。趙世洵兄生前曾說，詹在新聞報總經理任內，曾以金條十根資助浙江諸暨土共，經我多方查証，此事純為子虛烏有。事實上他是上了他的好友林漢達的大當。

林語堂控告林漢達

對於林漢達其人，台灣的年輕高級知識份子大都很陌生，但在五、六十年前上海的出版界，他卻大大有名。他是浙江寧波人，畢業於杭州私立之江大學英文系，應世界書局創辦人沈知方之聘，出任該局編譯所英文部主任，其時該所總編輯是留法返國的徐蔚南。徐氏的法文造詣很深，與黎烈文相較，據內行人說，他們兩人的工力，難分軒輊。徐曾將法國「短篇小說之王」莫泊桑所寫的唯一長篇小說「她的一生」從法文譯成中文，由世界書局出版，是當時全國暢銷書之一。後來黎烈文將另一本法文著名長篇小說「冰島漁父」譯成中文問世，也受到全國愛好文藝的讀者們的歡迎。不過這是題外話，不再多說。

林漢達負責編輯世界書局出版的初級中學英文教科書，總共六冊，每一學期使用一本，全國很多中學採用它為課本，可是出版半年以後，被林語堂博士與開明書局聯合向上海特區法院民庭告了一狀，說林漢達抄襲開明書局出版的初中英語讀本三冊，該三冊英文教科書係林語堂博士所主編。雙方所聘請的律師，我至今還記得有章士釗（行嚴）、鄭毓秀、江一平及虞舜等，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時報（當時大公報尚未在上海出版）都將該案作為本市新聞版的頭條新聞。後來杜月笙、虞洽卿等均應邀出面調解，最後的結果是世界書局出版的英文教科書全部停止發行，要將林語堂指出的抄襲之處予以刪除，並加修改之後，再出版應市。林語堂博士原已名滿全國，而林漢達當時卻沒沒無聞。可是這次訴訟卻使林漢達因禍得福，全國文教界一夜之間多了一位

名人。林語堂控告林漢達一案的和解曾得到過呂光博士的協助。我當時是世界書局編輯部一名小兵，和林漢達在一個大辦公室裡辦公，我那時只有二十四歲，公餘之暇，林氏和我們編輯部裡的幾個小伙子談論國事，經常和我們爭辯得面紅耳赤，我們認為要安內必須先攘外，而林氏則全力支持蔣中正委員長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他並列舉許多數字，認為我國國力與日本相較，差距太大，如中日不幸發生全面戰爭，我們的陸、海、空三軍不堪日本一擊，他認為我國的抗日時間表越延後對我越為有利。林漢達約於民國二十六年初赴美攻讀博士學位，我於同年八月十九日離滬赴香港，經廣東轉往桂林，抗戰勝利後一年我回上海，進新聞報後從詹文滄口裡獲悉，林漢達於珍珠港事變前得到教育博士學位後即自美返回上海，一面在大學教書，一面積極參加政治活動，他的思想也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由一個極右派變成了一個極左的文化人。我進新聞報一個月後即被派來台，因此沒有和林漢達再見面。據說，共軍攻佔上海前，林漢達曾向詹文滄保證其全家生命財產的安全，才使詹留在上海，不到台灣。想不到陳毅攻下上海，林漢達的支票沒有兌現，詹文滄逃到廣州，即被中共特務發現押解回上海，以後病死在青海勞改營裡。不過前幾年我從大陸方面獲悉，詹文滄和趙敏恒沒有趕上最後一架自滬飛台的專機，是由于當時軍事局勢逆轉得太快，他們無法按照原定的計劃撤退到台灣。現在時隔四十餘年，無法認定事實的真相。至于林漢達以後在紅朝則官運亨通，曾貴為北京政府

的教育部副部長，不過已被馬克思寵召多年。關於二林的版權官司，三十年前我在台灣時曾面詢林語堂博士，那位對人非常忠厚的幽默大師笑說：「那一縷青烟，早已消失，不必再提了！」

光明磊落談吐幽默

呂光博士對中共從來不存幻想，程滄波離滬赴港後，他也辭職離滬，經香港到達台灣，他夫人是南洋華僑閩秀，受過優良西方教育，端莊嫺淑，是標準的賢妻良母，但不會講中國話，兩人從戀愛到結婚以後，總是用英語交談。呂夫人沒有生育，也沒有收養小孩。在亂世，他們遷徙最為方便。呂博士移家台北之初，經常和新聞報旅台同事錢克顯、王介生、郭琴舫、朱稼軒、邵德潤、潘賢模及在下等見面，有時他邀請我們到他家吃便飯，有時我們到小飯館聚餐。等到程滄波自港來台以後，由呂博士發起，把聚餐範圍擴大為申新兩報在同仁餐會，經他登高一呼，大家立即熱烈響應，第一次申新兩報在同仁的餐會，申報方面參加的有陳訓念、王德馨、張明、濮德珩、吳守仁等，新聞報方面參加的有程滄波、呂光、邵德潤、王介生、郭琴舫、朱稼軒、潘賢模及在下等多人，當時錢克顯夫婦已被保安司令部槍決，罪名是「匪諜」，結案後該部還公布了一份資料，指稱錢氏在西瓜裡隱藏有關於台灣的經濟情報，自台灣經香港傳遞給中共。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用那種薄弱的證據來殺人，簡直是草菅人命。呂光博士是一位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在生疏者面前雖不苟言笑，但在熟友們面前卻滔

酒不絕，談笑風生。他談吐相當幽默，有時也透露一點新聞界名流如趙敏恒、魏景蒙等彼此之間

糾纏不清的風流韻事，雖趙、魏二氏早已作古，但涉及個人隱私的往事內幕，我不願重提。至于

呂博士的法學造詣及對法學教育的貢獻，俟有機會再為詳述，茲不多贅。



① 法學家呂光博士遺照。

② 呂光教授（中）與東吳大學法律系同學合影。

